

学者论范蠡



主 编 王广深 李显杰 王建中 白万献

执行主编 侯同江

中国商业出版社

学者论范蠡

——'07 中国·南阳(浙川)商圣范蠡经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

王广深

李显杰

王建中

白万献

执行主编 侯同江

中国商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学者论范蠡 / 王广深等主编. —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5044-6261-9

I. 学… II. 王… III. 范蠡—人物研究 IV. K82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30951号

学者论范蠡

主 编	王广深 李显杰 王建中 白万献
执行主编	侯同江
责任编辑	孙锦萍
出版发行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100053 北京广安门内报国寺1号)
印 刷	南阳寰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85×260 毫米 16 开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20.5 印张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00.00 元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可更换)

《学者论范蠡》编委会

顾问:黄兴维 朱广平

主任:解朝来

副主任:文学林 王 中 王广深 崔 军
李显杰 刘承举 王建中

编委:彭廷政 侯同江 李仁瑞 郭建新
卢永刚 朱道平

主编:王广深 李显杰 王建中 白万献

执行主编:侯同江

贺 电

'07 中国南阳(淅川)商圣范蠡经济思想研讨会暨经贸洽谈会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

范蠡是中国先秦历史上的一位特殊重要人物,兼为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最终为大商业家,影响非常深远。据《吴越春秋》及《越绝书》等文献,他是“楚宛三户人”。现在范蠡经济思想研讨会在其故乡召开,是值得纪念的大事,相信与会各位先生必能推陈出新,达成重要成果。

我在十几年前曾据马王堆帛书推论《越语》中范蠡思想,蒙会议约请,本应前来向大家请教,但因所负责科研项目公务,无法如愿,深感遗憾,特在此致谢,并谨祝研讨会暨经贸洽谈会圆满成功!南阳市、淅川县兴旺发展!各位领导、专家和女士、先生们诸事如意!

李学勤

2007 年 9 月 15 日于清华大学

(李学勤,1933 年生于北京,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现任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楚文化研究会理事长)

序 言 (一)

袁祖亮

闻悉《学者论范蠡》一书付梓出版,倍感欣慰。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应该说,是南阳、河南乃至全国范蠡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可喜可贺!

河南是一个人口大省,也是一个文化大省,文化底蕴博大厚深。“自古贤才踞中原”,虽有溢美之嫌,也不失是对河南的赞誉。省委书记徐光春概言:“我们的历史那么悠长,文明也在这儿产生,而支撑我们人类发展的重要部分就是文化,中原文化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而南阳,作为豫西南的经济文化重镇,更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南阳古称宛,历史文化悠久,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早在战国时期,南阳就是全国有名的冶铁中心,两汉时有“商遍天下”、“富冠海内”之誉和“南都”、“帝乡”之称,为全国大都会之一。当今,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南阳自古及今英才辈出,曾哺育出百里奚、范蠡、张衡、张仲景、诸葛亮等历史名人,彭雪枫、冯友兰、姚雪垠、李季、王永民、二月河等现当代名人。这些都是千万南阳人的光荣和骄傲。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我们的祖国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政治稳定,经济腾飞,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作为河南省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和潜力的南阳市,按照河南省委、省政府为其确立的建成“我国中部地区交通枢纽、全省新的经济隆起带和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从其自身发展的大局出发,适时提出“建设经济强市、文化名市、生态大市”的战略发展目标。’07中国·南阳(淅川)商圣范蠡经济思想研讨会暨经贸洽谈会的召开正是落实这一目标的体现。

范蠡,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春秋后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和大商人,是南阳的“四圣”之一。范蠡因其精通韬略,足智多谋,曾拜为越国大夫,后任上将军,担任相国要职。勾践三年(前494年),吴王夫差大破越军,勾践偕妻等入吴称臣,范蠡亦作吴国人质两年。归国后,他辅佐勾践卧薪尝胆,图强雪耻。经过10余年努力,越国终于转弱为强。在范蠡建议下,勾践发兵伐吴,袭破吴都迫夫差自杀。越国终于吞并吴国。

范蠡在灭吴后,决计急流勇退,乘舟浮海到达齐国,定居于陶,变名易姓为鸱夷子皮,又改名陶朱公,以经商致富。因为经商有道,遂成巨富,“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民间亦尊其为财神。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并肯定他“富好行其德”的高尚品德。

范蠡认为对付敌人要随形势变化制定计策,强盛时应戒骄,衰弱时要争取有利时机,创造有利条件,使转弱为强。又认为物价贵贱的变化,是由于供求关系的有余和不足,主张谷贱时由官府收购,谷贵时平价出售。其言论见于《国语·越语下》和《史记·货殖列

传》。

在我国古代史上,范蠡的哲学观点、政治才干、军事谋略、外交思想、经济理念和商业道德,曾经闻名四方,显赫一时。千百年来被历朝历代的商贾所尊崇、效法。他的历史功绩在先秦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特别由于他是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的著名大商人,通过经商积累巨富,他的经济思想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很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而其主张货物流通、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更具有开创性的深远意义。

对于范蠡,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文人学者对其都有很高的评价,说他是“忠以治国,勇以克敌,智以保身,商以致富”。宋朝诗人吕本中在《过定陶范蠡庙》中写道:“悠悠千载五湖心,古庙无人锁绿荫。为问功成肥遁后,不知何术累千金?”清人李琪于《崇川竹枝词》中云:“鸱夷已泛五湖船,车马犹留湖水边。一卷养鱼经若在,铸金师事自今年。”清代诗人徐公修作《范蠡》诗曰:“艳色吴王嗜好投,苕萝村内美人求。居陶业振工牟利,霸越功高早退休。两国甘心抛相印,五湖浪迹泛扁舟。铸金故主空摹象,凤举鸿冥不可留。”这些诗文都热情歌颂了范蠡这位名垂青史的历史人物。

除文人赞誉之外,史学界和学术界对范蠡都有极高的评价。说他文武双全、德才兼备、忧深思远、坚忍不拔,是“治国良臣、兵家奇才”、“商学大师”、“经营之神”。说他是“春秋末年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国古代谋臣的楷模”、“中国古代第一个弃官经商者”、“沿海经济开发区的创始人”等等。

也因为如此,范蠡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在中国辉煌的商业文化宝库里,他留下了可贵的遗产,诸如“什一之利”、“陶朱事业”、“陶朱遗风”、“富行其德”、“浮家泛宅”等成语典故均是因他而来的。甚至人们看到或听到“忍辱负重”、“韬光养晦”、“急流勇退”、“弃官经商”等成语典故也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范蠡。

其实不仅仅局限于国内,范蠡经济文化等思想也对东商亚、欧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我接触到的一些香港地区、日本、欧美的客人,提到范蠡,很多人还是滔滔不绝,盛赞不已。

所以,范蠡作为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特别是作为中华商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一生三迁,救越灭吴,施展了军政谋略;去越辞官,显示了人生智慧;治产致富,体现了经营才华。作为华商始祖的范蠡,其经济思想丰富而深邃。

正因为如此,不仅仅从文化遗产的角度,从经济等领域研究、开发、利用、发掘范蠡的思想也理应成为研究的重点、热点。南阳市委、市政府、市政协、范蠡研究会适时提出召开“’07 中国·南阳(淅川)商圣范蠡经济思想研讨会暨经贸洽谈会”意义也即在此。

作为南阳人,我对商圣范蠡是很有感情的。前几年就有南阳的同志提出召开一个关于范蠡的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研讨会,并且已经筹备召开了,那时候的研讨会的规模是小范围的。

南阳范蠡研究会工作很早就展开了。成立 10 多年来,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接触到的两任会长李兆钧、解朝来带领研究会的同志积极开展范蠡思想研究、学术交流和宣传范蠡的活动,先后发表了《论谋略家范蠡》、《从南阳走出的商家之圣——范蠡》、《商圣范蠡原籍考证》等一分有分量的研究论文,出版了《商圣范蠡研究》、《歌颂范蠡诗集》、《商圣范蠡评传》、《历史上的范蠡》、《范子研究》等引起研究者关注的专著。

南阳市委、市政府领导黄兴维书记、朱广平市长都对范蠡研究倾情支持。在南阳市委、市政府、市政协等的全力支持和淅川县委、县政府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的大力协同下,

2007年9月19日至21日,‘07中国·南阳(浙川)商圣范蠡经济思想研讨会暨经贸洽谈会成功举行。这是国内第一次专门研究范蠡经济思想的学术会议,与会专家、学者代表共80余人,除研究范蠡的学术“宛军”主力参会外,一大批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专家、学者,诸如全国秦汉史学会会长、北师大王子今教授,河南大学博导朱绍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导陈勇勤教授,南开大学博导孙立群教授,中国军事科学院吴如嵩教授,原海军某部夏廷献大校,著名作家二月河等亲临会议。因事未能如愿到会的国际知名范蠡研究专家、日本青森中央大学原副校长、研究生院教授酒井甫特意寄来他的研究文集和为会议准备的论文,并委托上海东华大学叶荣鼎教授代为宣读;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专门向会议发来了贺电,可以说这次会议的规模和规格是盛大的、空前的。

研讨会共收到论文80多篇,有30多位学者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从会议论文集和会上交流情况看,专家、学者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对范蠡经济思想及其实践进行了深入探讨:一是范蠡的历史地位问题,二是范蠡的宏观经济理论,三是范蠡的中观商道论,四是范蠡的微观经营论,五是范蠡思想对现今的影响,六是范蠡的民本思想,七是范蠡与中外经济思想史名家的比较。论文论点新颖,资料详实,论证有力,代表了当前中国范蠡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

在这次研讨会上,众多专家学者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范蠡经济思想及其实践进行了探究。比如说,有的学者认为范蠡经济思想有11个方面的内容:审时度势预测行情,选择地利注重环境,择人公正选贤用能,贵贱反复贱买贵卖,完物上种货真价实,早则资舟水则资车,加速周转行如流水,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农末俱利协调发展,取利守义富而好德,以诚取信广而告之;有的学者认为,范蠡经济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发现并积极运用“二·六”丰歉规律和“八·三”调控规律,发现并积极运用市场营销规律,范蠡主张“贱收”、“贵售”,就是“干预”和“调控”。

这句似乎当代经济学家的名言,出自2400多年前的越国上大夫范蠡之口,实际上这是对价值规律的发现和自觉运用。有的学者认为,范蠡经济思想的精髓可以用“厚德立身,诚信为本,慎思敏行,辩证经营,亲民济困,天下共富”二十四个字来概括。范蠡经商,崇尚道德,所以才能有“三致千金,富行其德”的思想境界等。

当今时代,市场经济大潮涌动,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范蠡这位既有理论建树又有实践经验的商业大家。研究陶朱公经济思想,可以丰富现代商业经营管理智慧,弘扬陶朱公商业精神;可以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商业文化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学习陶朱公可以提高现代商人的道德和文化素质。《学者论范蠡》一书收录了一大批专家、学者、研究生等关于范蠡的经济思想等方面的文章,涵盖了一批老、中、青研究队伍,使范蠡研究具有了相当的研究水准,彰显出了勃勃生机。

希望此次论文集的出版,能够促进对范蠡的经济思想研究向更深层面深入,带动更多的人来关注范蠡、研究范蠡、师法范蠡,弘扬范蠡经济思想,更好地服务于当前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

2008年6月1日于河南郑州

(作者:袁祖亮,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郑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 言 (二)

解朝来

范蠡,春秋(公元前 770—前 476 年)末战国(公元前 475—前 221 年)初楚宛(今河南南阳)人。“居楚曰范伯”,“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子皮,在陶为朱公”。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中华民族共尊的文财神,商家之圣。他的一生时隐时现,时官时民,但无论是做官、事农、经商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是他重农更重商的思想、理论、实践,对我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一

据先秦两汉时期的史籍记载,范蠡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在楚宛读书隐居阶段;在越国从政做官阶段;在齐陶务农经商阶段。每个阶段约二十多年,卒年七八十岁。

(一) 范蠡在楚宛

我国最早记载范蠡籍里的人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他在《太史公素王妙论》一文中说:“蠡本南阳人。”这就从早期文献的视角否定了相传的徐人说、吴人说和宣城人说等几种说法,从而确定了范蠡祖居地或出生地在南阳的基本框范。

范蠡出生和生活的年代,是我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门坎”时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各国公室业已衰弱,大夫日强,春秋时代的中原争霸进入尾声,战国时代的“七雄”日益崛起。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战国初期的牛耕农业和冶铁手工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尤其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官工、官商,即“工商食官”制的瓦解,为范蠡从政,乃至务农、经商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机遇。

范蠡的“祖”国——楚,芈姓,是一个周初封于丹阳(今河南淅川丹江库区一带)的奴隶制国家。楚文王(公元前 689—前 677 年)在位时,由丹阳迁郢,“定襄阳以为门户,至灭申(南阳古国),遂北问以抗衡中夏”。从此,申县(中国最早的县之一,即春秋末宛县)成为楚国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的战略要地。楚国采取“申人治申”的政策,对于巩固楚在今南阳一带的政治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楚庄王(公元前 613—前 591 年)时,镇压蒸野(今新野)楚令尹斗越椒叛乱,以沈尹、孙叔敖为相,改革政治,勤于生产,虽连年用兵,“商(行曰商)、农、工、贾(处曰贾),不败其业”,鲁、宋、郑、陈皆服于楚,王霸诸侯。

楚灵王(公元前 540—前 529 年)统治时期,大约是范蠡出生的年代(一说生于前 536 年)。灵王因系杀王自立,政局一度动荡不安。但从公元前 538 年灵王大会蔡、陈、郑、许、徐、滕、顿、胡、沈,小邾之君及宋世子佐、淮夷于申(此年说明申县尚未被宛县所取代)的情况看,“赫赫楚国”仍具“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原大矣”的地位。此时楚国的北镇——申(宛),气候温暖湿润,水利资源丰富,土壤肥沃,为水稻生产提供了得天

独厚的自然条件。浙川下寺2号墓出土的用失蜡法铸造的“天下第一铜禁”,1号墓出土的稀世音乐编钟,南阳市城区出土的“弃疾(即楚平王)自作簠”,以及下寺10号墓出土的玉茎铁剑等^①,集中代表了春秋晚期、战国早期楚国传统冶铜业、新兴冶铁业的发达与先进。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文化氛围下,青少年时代的范蠡,较早受到了先进楚文化的熏陶和濡染。

楚灵王死后,原被立为王的子比自杀,弃疾即位,是为平王(公元前528—前516年)。平王统治时期,“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大意是楚国掌权的人多,意见不一致,也没有一定的计划。正是由于“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背景,平王听信谗言,以太子建和太傅伍奢叛,杀奢及子尚。子员,即伍子胥逃亡吴国,并由此导致了楚伯嚭奔吴,文种、范蠡入越的重大事件。公元前506年,吴在伍子胥的谋划下攻入楚都郢,楚从此失去了霸主的地位。

青年时代的范蠡正值楚平王执政时期。他耳闻伍奢伍尚父子被杀,伍员出逃;目睹在楚大夫费无忌佐政下日益腐败的政治,无不悲恻不已。在“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的环境中,才华横溢的范蠡被迫选择了隐居求志的人生道路。

据东汉赵晔撰《吴越春秋》载,范蠡早年倜傥不群,不为人所知。“大夫种姓文名种,字子禽。荆平王时为宛(由申演变为宛的最早记载)令,之三户之里”。有一天,文种驱车去三户拜谒范蠡,范蠡不仅视而不见,还任其自家的狗在窠洞里狂吠。跟随种的从吏担心自己的长官被狗咬伤,就用衣服遮掩着这尴尬的场面。文种说,不用遮掩,“今吾到此,有圣人之气”,“乃下车拜,蠡不为礼”。相传,文种三请范蠡,蠡终于为种的挚意所感动,遂许种以驱驰。当时,地处长三角的吴国与地处杭州湾的越国“同风共俗,地户之位非吴则越”。然而从长远看,越更具有统一东南地区的潜在优势,加之吴楚系交战之国,“君子逢时,不入仇邦”,文种、范蠡拒吴入越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

(二) 范蠡在吴越

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听说吴王夫差日夜勤兵,“欲先吴未发往伐之”。范蠡劝他不要轻易动武。蠡说:“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他所说的“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是他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能守着成业的得天时,能平定倾覆的得人和,能精简节约的得地利。他所说的“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就是要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办事。可惜勾践没有听他的话,结果越军被打得大败,只剩下五千人,困守会稽。在越国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范蠡提出了“定倾”的具体办法:“卑辞尊礼,玩好女乐,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之与市”。勾践听了范蠡的话,派文种入吴请和。文种以美女宝器“间献吴太宰”,又以吴王不赦,勾践将杀妻、燔宝、五千越兵触战以死相威胁。伍子胥进谏说:“今不灭越,后必悔之。”吴王不听,罢兵而归。

勾践回国后,为了激励自己,“苦身劳心,夜以接日,目卧则攻之以蓼,足寒则渍之以水”;“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他还“亲自耕作,夫人自织,与百姓同其劳”;“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为了发展生产,增加人口,他“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百姓生儿育女,“令医守之”,而且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

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不与之飧”。他欲使范蠡治国家。范蠡说：“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填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于是，勾践以国政属大夫种，而使范蠡与大夫柘稽行成，为质于吴。蠡“入备扫除，出给趋走”，君臣共处奴役的生活，达三年之久。

约在公元前490年，范蠡结束在吴的人质生活归国。勾践重新提出“节事”的问题。范蠡说：“节事者与地，唯地能包万物以为一，其事不失。”范蠡的话，主要是说土地是万物之本。农事做得好，可以生长万物；田野开辟，府仓实，民众殷，从而道出了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复兴计划。勾践很赞许这个国策，甚至于说：“不谷之国家，蠡之国家也”。即“我的国家，就是范蠡的国家，请范蠡考虑怎么治理！”范蠡坦言，“四封之内，百姓之事……不逆天时，五谷陆熟，民乃蕃滋”，“蠡不如种”。“四封之外，敌国之制……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反，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种亦不如蠡也”。勾践遂令范蠡主管军队，而文种负责治理国家。

通过“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越国的国力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482年，吴国农业欠收，夫差竟决定北伐齐晋称霸中原。依照范蠡的计谋，等到吴军完全到达黄池以后再行动。于是把二十年积聚的兵力，分成三路，或断吴军归路，或直逼吴都姑苏。吴军大败，吴王夫差只好向越求和，越国自度不能一举灭吴，答应言和，继续加紧灭吴的准备。公元前478年，吴国“大荒荐饥，市无赤米，国廩空虚”，越王勾践再次发起了灭吴之战。吴军崩溃，越军直至姑苏城下。公元前473年，吴王被围困于姑苏台上，夫差只好派王孙雎袒衣膝行至勾践面前，希望像勾践、范蠡当年那样为人臣虏。范蠡说：“往日是天把越赐予给吴国，吴国不要。今天上天赐吴于越，越不能违背天命而接受吴的投降”。吴王夫差自缢而死。越王勾践灭吴后，步吴之后尘，也北上会诸侯，“号称霸王”，故墨子说“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

（三）范蠡在齐陶

范蠡事越王勾践，苦心深谋二十多年，终于灭吴。在回国途中，范蠡辞于王说：“君王勉之，臣不复入越国矣”。其原因，据《国语》说，“今事已济矣”。且不愿接受王“与子分国”的厚遇；不怕违者“身死，妻子为戮”的下场，“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范蠡走失后，越王用“良金”为他塑了一尊铜像，要求大夫们每十天对蠡像朝拜一次。“环会稽三百里以为范蠡地”。此后，范蠡便走上了由人到神的历史转变。但据《史记》记载，“勾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还反国，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遂谢绝勾践恩威相加的挽留，“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相传与范蠡偕入五湖者，还有吴越第一美女西施。文种未听蠡言，后以“作乱”罪被勾践赐剑自杀。

在司马迁的笔下，范蠡并非“莫知其所终极”，而是浮海到了齐国，或许由于“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等原因，战国时期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向。蠡之所以变姓名，出于慕伍子胥的忠直，叹为夫差所杀，尸体被装在皮革里，抛入江中，名曰“鸱夷浮江”之故。

范蠡在齐国首选以衣食为本的农业。“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随着范蠡家产的剧增，了解范蠡的人开始多了起来。当齐平公听说原越国大夫、上将军范蠡变姓名，在其辖属的东海之滨种庄稼时，执意让范蠡出任齐国宰相。范蠡认为，“在家务农能积聚千金，出去做官能位至卿相，这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很难做到的事情。一个人长期受到如此高的尊重和礼遇，不是一个吉祥的征兆”。于是“乃归相印”。

接着“尽散其财”，把家里的粮食、牲畜、钱币分散给知己的朋友和邻里乡亲，只带一些贵重的物品，悄悄地离开了齐之海畔，来到了战国时期知名度很高的陶地。

范蠡“止于陶”，并非追求以守周礼见称的先贤圣地，而是“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此后，范蠡“自谓陶朱公”，重新节制自己的需要追求，父与子亲自耕种畜牧。此间，范蠡用“子欲速富，当畜五牾（zì，即牛、马、猪、羊、驴五种母畜）”之术，使鲁之穷士猗顿迅速摆脱了“耕则常饥，桑则常寒”的困境，走上了致富之路。不久，范蠡由农村走进了城市，开始了他的以买卖方式使商品流通的经济活动，即商业活动。囤积储存，等待时机，转卖货物，争取十分之一的利润，不固守一城一邑之经营，没过多长时间，其财产达到了上亿的数字，成为战国初期首屈一指的富商，“天下称陶朱公”。卒后，民间奉他为招财利市的文财神；河南南阳、浙江、江苏、山东，即范蠡出生和生活过的地方则普遍推崇他为中国商家之圣。

二

范蠡之所以被尊为中国商家之圣，主要建立在他对那个时代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以及对后来历史进程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圣人”，是一位仅次于“神”的具有极高智能和道德的人。但不能忽视的是青少年时代的范蠡已脱颖而出，成为有“圣人之气”的超俗之人；中青年时期的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兴国，已成为越国人民最受敬重的护佑神之一。范蠡在如此高的起点上下海经商，又具极高的经商智能和极高的商业道德，这样就从次“神”的标准确立了一代伟人尊为圣的政治基础。具体地说，支撑范蠡为商家之圣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弃官经商第一人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列国士、大夫、卿三级任官职者，不乏由商而仕，因时乘势，显名当世的。春秋时齐国的管仲，战国时秦国的吕不韦，就是由商而仕，官至相国的人物。这一时期的商人，甚至是“家累千金”的大商贾，何以弃商从政？《战国策·秦策五》揭开了这个问题的秘密。吕不韦在邯郸做生意，见到了在赵为人质的秦子楚。吕认为“此奇货可居”，遂决定用金钱谋子楚继承王位。他回家跟父亲说：“耕田之利几倍？”父亲说：“十倍。”“珠玉之赢几倍？”父亲说：“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父亲说：“无数。”吕不韦认为：“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由是吕不韦走上了弃商从政、追求“无数”倍利润的“立主”之路。这件事虽然发生在商品经济较前发达，商人地位较前提高的战国晚期，但范蠡当年“弃官经商”的壮举并不为后世从政之官员所接受。由此更加凸显出一个位至越大夫、上将军、齐相的高官，一个不为越王“分国而有之”所驱动的重臣，在功成名就之后，毅然决然辞职下海，心甘情愿地从事在吕不韦父子心目中只有“十倍”之利的农业和有“百倍”之利的商业，是何等的正确和伟大。遍览中国通史，弃商从官者不乏其人，然而反其道而行之者，实则范蠡为第一人。

（二）事农重商力行者

在中国古代社会，农业有大业之称，为国家之本。“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范蠡下海后，首选与“饥”、“寒”关系密切的农业和畜牧业，这应是一件破井田之制，开土地关系私有化的创新之举。但在农、工、商经济部门中，范蠡更加重视在商业领域中谋发展。

在我国商周社会里,由于残留有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社会虽有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只有奴隶主才是产品的所有者、出售者。这种在公社基础上的商品生产,是通过贡赋关系,由接受贡赋物的国家来实现的。所以,当时的工商业者基本上是一种官府豢养的官工、官商,即《国语》中所说的“工商食官”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工商业主要由官府统一经营管理,组织加工,其产品由官府核价出售,其前提是必须满足奴隶主贵族的享用。商人经营的产品,多属珠、玉、皮革等贵重货物,时有“商不出则三宝绝”之记载,显然这一制度严重阻碍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春秋战国之际,由于铁制工具的普遍使用,不仅促使了农业与手工业的进一步分工,而且促使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的出现,范蠡正是这个“商人”阶级中的重要一员。司马迁称他们为“素封”,即无官爵封邑而和封君一样富有的人。范蠡不为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官工、官商制度所束缚,率先退出官场,下海经商,只从事马克思所说的“产品交换”的劳动,在生产与消费的激流中勇敢地架起了一座中介的桥梁,从而成为这一时期由官营工商业向私人经营方向转化和过渡的领军人物。

(三)在商业活动中创新了一套商品经营的理论

其一,“贱取”的理论。也就是收购的理论或进货的理论。收购与进货,是一切贩卖商品者从中谋取利润的起点。在买进货物的问题上,范蠡提出了“贱取如珠玉”的观点,也就是当某种商品的价格跌落到一定程度时,就要把它当作珍珠宝玉一样购买进来,因为“贱下极则反贵”。另外,他提出了备货的思想。所谓“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等观点。上述观点虽然在表达的方式上有所不同,实质仍是用“贱取”的方法获得最低的进货总成本的一种变术。

其二,“贵出”的理论。亦即销售的理论。把商品卖出去,实现商品由实物形态到货币形态的转化,是一切从商之人进行商品交换活动的终点。在卖出货物的问题上,范蠡提出了“贵出如粪土”的观点。他以为当某种商品的价格涨到最高点时,就要把商品当粪土一样抛售出去,因为“贵上极则反贱”。

其三,“积著”的理论。也就是储备理论,亦即库存理论。因商品进入消费领域以来,需要在流通领域停留一段时间而形成。合理的商品储备是商品正常流通的必要因素,向有“没有商品储备,就没有商品交流之说。”范蠡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积著之理”,即储备货物的道理,“务完物”、“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的观点。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商家在积贮货物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注意货物的质量,务必使自己经营的货物保持完好。在经贸活动中,不要储存腐败变质的食物,更不要希望在物价上涨时卖上大价钱。

其四,“无息币”的理论。亦即资本流通的理论。商人在流通领域中投入一定数量的货币,以获取更多数量的货币,是商人资本的生命。如果中断资本的流通,无疑要商人变成守财之奴,或结束商人资本的生命。在这个问题上,范蠡提出了“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的观点,主张商人手中的钱,要像流水一样买进卖出,不停顿地运动着。

其五,“农末俱利”的理论。亦即有关价格的理论。在粮食买卖中,范蠡以为“夫粢,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也。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这段文字的大意是,在买卖粮食的时候,如果国家以五十为正常价格的话,降到二十,农民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升到九十,又会使商人无利可图。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经营粮食商品;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去发展农业生产。商人与农民同时受害,就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政府把粮食价格控制在八十和三

十之间,这样农民和商人就可以同时获利。

上述理论中,“贱取”、“贵出”的理论,也就是“贱买贵卖”的理论,是一切从商者从商品流通中取利的基本理论。这一理论在今天已不足为奇,但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却是一个重大发现。它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个体经商者提供了“致富”之术,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 范蠡的经商理论,是一切从商之人治家、富家的基本理论

在范蠡的经商理论库中,既有治国、富国的“农末俱利”理论,又有治家、富家的“贱取”、“贵出”等进货与销售理论。按照这套理论,自家可以发财,他家可以致富。稍晚于范蠡的周人白圭,战国末年的卫人吕不韦都可能是用范蠡之策“施家”,先官后商或先商后官的巨富。白圭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思想与吕不韦的“贩贱卖贵”思想,都没有超出范蠡的“贱取”、“贵出”的经营体系。尤其是白圭的“观时变”思想,即根据市场行情变化,提出经营决策的思想,以及他的“治生之术”,更是没有脱离范蠡的“与时逐”与“施家”之策的理论宝库。

(五) 范蠡重商、经商的思想、理论与实践,为古代简单商品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所谓简单商品经济,就是以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以通过商品交换满足生产者自己需要为目的的经济形式。它存在于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末期以前,在当时的整个社会经济中虽然只处于从属地位,但不同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其特点是“为买而卖”。在范蠡从商的年代里,由于铁制工具的普遍使用,私工、私商经济出现了蓬勃发展之势,为买而卖的个体生产者,为卖而买的个体经商者,往来于列国之间,时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之说。但是真正重商、从商、力商,在商业活动中创造出了一套经营理论,且这套理论可以治家、富家者,惟范蠡其人。他既不同于先商后官,在官场上提出“富国”理论的管仲,也不同于先商后官,在官场上用金钱,与诸侯“分庭抗礼”的子贡,他反其道而行之,以“富家”为目的,坚定不移地走“贱取”、“贵出”的个体经商之路,一直走到“子孙修业而息之”。他经商的成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使愈来愈多的人看好了与其相同的道路,从而形成了一支经商大军。在这支大军的推动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商周以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六) 富不忘贫,散财于民,开创了“富好行其德”的历史先河

范蠡的后半生,先后有务农、农牧结合,以及从商的不同经历,主要以经商为主。但不管他从事何项产业,都是发了大财的,或“居家致千金”,或“致产数千金”,或“致资累巨万”。面对家庭的巨额财产,范蠡没有利令智昏,而是“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范蠡的善行义举,不仅在当时“皆有荣名”,而且“名垂后世”。因无其二者,故受到了太史公司马迁极高的评价。考察世界历史,范蠡生活的时代,正是希腊奴隶制社会繁盛的时期。稍晚于范蠡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提出了等级森严的理想国制度,把治国的贤哲列为第一等人,卫国的武士列为第二等人,农夫、手工艺者、商人列为第三等人。把从事体力劳动者视为被“治于人”的人。在希腊一些较发达的城邦,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但没有一个辞职高官、退役将军务农、经商,甘作“第三等人”的先例,在这个层面上讲,范蠡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商圣”。

三

为什么范蠡做官、务农、经商,样样都能够大获成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 天资聪睿,从小就有一种“圣人之气”的生理、心理素质。青少年时代的范蠡在南阳受到了楚文化、列国文化的良好教育,他师从计然,学到了一套治国、治军的过硬本领。

(二) 多谋善断,精于用阴阳来比附、观察社会现象,提出解决国是的方略。他认为天时、气节随着阴阳二气的矛盾而变化,国势的盛衰也不断在转化。对付敌国要随形势的变化制定政策,“人事与天地相参,乃可以成功”。

(三) 经商有道,长于用治国之策治家,用兵战之法经商。在务农与经商的活动中,率先提出了一套理论联系实际的致富圣经。

(四) 苦身戮力,坚忍不拔。不管是在逆境中为人质“扫除”,困境中“耕于海畔”,还是在顺境中交易“货物”,都能够吃大苦,耐大劳,承受为臣难以忍受的耻辱,为民难以忍受的困难,有一种特别能上能下的精神和力量。

(五) 义利经商,商德无量。在经商中,范蠡坚持以“完物”取信于民,以“什一之利”惠及于民,以“千金”资产散分于民,从而赢得了诚信,占领了市场,换回了巨额利润,再回报社会,走共同富裕之路。

尽管范蠡的成功经验,尤其是他经商成功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早在战国时期已为个体经商者所效法,并成为治家、富家的“商经”,但他的“商经”并不多见于文献记载,甚至其本人的历史也鲜为人知。

我国最早记载范蠡事迹的史书是成书于春秋末期的《国语》。但《国语》只记载了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兴国的事迹,没有涉及他青少年时期在南阳的活动,也没有涉及他浮海之后的去向,自然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的档案而矣。西汉时,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较详细补充了范蠡浮海后,去齐、止陶、务农、经商的经历,使时人和后人方知范蠡还是一位经济学家,但仍不知范蠡青少年时期在南阳的事迹。不过,司马迁在他籍里的问题上说了一句可免后人在大范围内争论的话,那就是“蠡本南阳人”。东汉时期,会稽山阴人赵晔撰《吴越春秋》,进一步肯定了他的籍里,并与同时期袁康所撰的《越绝书》增添了不少有关范蠡在南阳的史事与民间传说,为汉以后的人们提供了一份比较完整的历史人物概貌。

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和《史记·货殖列传》里,司马迁在用一定笔墨记载范蠡务农、经商的同时,用较重的笔墨记载了范蠡的经商之道。但司马迁并没有把范蠡当作“商家”或“货殖(经商)家”的代表人物来称谓,更没有把“商家”当作一个独立的学术思想流派来看待。后代,随着轻商、贱商风气的日盛,经商之术渐为士人所不齿。19世纪末,梁启超通过读史,方“知吾中国先秦以前,实有此学”。今天我们所说的商家,应是春秋战国时期与儒、墨、道、名、杂、农、阴阳、纵横诸家共存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它以个体经商致富为目标,有自己学派的带头人,有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有反映自己学术观点的著作,有用自己的学说治家、富家的一支阶级队伍,并曾为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一个特殊学术思想派别。

肯定了商家的存在及其历史地位,可以看出商家的代表人物范蠡,是一位中华民族共尊的财神,当之无愧的商圣。

在范蠡之后的封建社会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没有离开“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重农轻商的政策。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商品经济必然长期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我国的商品经济在最初的几十年里仍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把经济建设列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中心,在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了加速我国现代化的步伐,我们必须借鉴古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尤其是社会形态转变过程中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范蠡作为古代商人的杰出代表,商业经济的形象大使,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很好的教科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大规模的销售,而不是面向个别的销售,因而需要这样的商人,他不为满足他个人需要而购买,而是把许多人的购买行为集中到他的购买行为上。”这就是说,在生产与消费之间,要促进大规模的销售,亦即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无疑需要有大批商人来作中介,并发挥他们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以完成商品价值的实现,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1958年,毛泽东同志就我国商品经济滞后的问题进一步指出:“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一个国家,商品生产不是消灭的问题,而是要大大发展。”在今天充分具备“大大发展”的条件下,研究范蠡的经商之道,弘扬范蠡的商业精神,需要认真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局面。

2. 从事国有商业、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的人员,在商业活动中应该具备古人和今人的基本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履行合同、公平交易、诚实无欺、热情周到、礼貌待客、讲究信誉。

3. 富不忘贫,走共同富裕之路。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生产发展了,生产成果不能归少数人享有,而是要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服务,先富之人帮后富之人,先富之地区帮后富之地区。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这既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又是我们顶礼膜拜的商圣遗训。

在一位堪称世界级的圣贤之乡召开'07中国·南阳(淅川)商圣范蠡经济思想研讨会暨经贸洽谈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南阳人民的大手笔和数典念祖的大活动。它对于提高南阳知名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007年7月26日

(此文曾发表于2007年9月4日《南阳日报》,题目是《从南阳走出的商家之圣——范蠡》。作者:解朝来,政协南阳市委员会主席、南阳范蠡研究会会长)

目 录

贺 电李学勤	
序 言(一)	袁祖亮 1
序 言(二)	解朝来 1
“千古一陶朱”:范蠡兵战与商战的成功	王子今 1
论范蠡的成功之道	朱绍侯 9
范蠡对商业事理的思考与亚里士多德对交换学理的思考	陈勇勤 14
论范蠡与西施故事的真实性	孙立群 21
试论商圣范蠡的经济思想	吴如嵩 25
经济思想如日中天 致富勋业光照千秋	夏廷献 29
范蠡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建设的启示	(日)酒井甫 32
论范蠡	程有为 35
论范蠡的商圣地位	李显杰 刘太祥 39
浅论春秋时期的政治家范蠡	任崇岳 45
范蠡弃官从商的历史地位及其评价	王兴亚 49
范蠡“三致千金”战略义举对现代经济的启示	叶荣鼎 57
范蠡的历史定位——商圣	侯同江 61
范蠡思想研究简论	刘纪兴 63
范蠡文化精神初探	夏冠洲 70
范蠡为何称“商圣”	刘长香 79
范蠡经商思想研究初探	李津生 杨 涛 81
浅谈陶朱公的经济思想	李 颖 98
上则富国 下则富家	尹选波 101
范蠡治家思想浅探	刘炳强 104
范蠡商业思想初探	赵秀玲 王绥臻 115
范蠡经商致富的秘诀何在	李仁瑞 119
对商圣范蠡成功之路的思考	白万献 123
范蠡的平糶法分析	卢永刚 126
范蠡的经济思想刍论	李玉洁 黄庭月 130
“计然之策”与“轻重之术”的理论归属	王京龙 134
试论范蠡及其经济思想	袁明英 137
陶朱公的经商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周福举 142
商圣范蠡经济思想刍议	李显杰 146
范蠡商业思想管窥	张玉书 149
陶朱公的传说与其商业思想的确立	王江峰 157
从价值规律看范蠡的经营理念	朱道平 160